

论中国丝绸之路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魏志江¹ 李 策^{1,2}

(1.中山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吉首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文本在探讨丝绸之路学术史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概念以及丝绸之路范式研究的演化做了进一步论述,并对学术界有关“丝绸之路学科体系”的争议进行了评析。文本尝试阐释中国丝绸之路学科体系的研究内容、核心范式、理论模型与学科结构,并针对丝绸之路学科的特点,提出了区域研究、动态研究和创新研究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形成中国话语的学术体系和学科范式提供了学术支撑。

关键词: 丝路学;丝绸之路;学科体系;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425(2016)02-0001-08
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16.02.001

人类社会交往的渴望推动了世界文明间的相互吸引。公元前 5 世纪前后,一条联通亚欧大陆主要文明系统的大通道逐渐形成。1877 年,西方学者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用于描述汉代时期的中国和中亚、西亚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交通线。由此引发了东、西方学界对这条贸易和民族迁移通道持续百余年的探索与研究。伴随丝绸之路沿线考古新发现和专业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丝绸之路研究的指涉对象和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呈现出时间和空间的二维扩展趋势。依托丝绸之路开展的专业研究在中国逐渐演化成西北舆地学、西域学、敦煌学等研究分支,在西方则广泛出现在东方学、汉学、中国学等研究中。但是,这些学科中所描述的丝绸之路研究概念交叉、外延含糊,研究边界语焉不详,难以形成知识体系以及学科上的独特体系。特别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丝绸之路的研究成为显学。但是,作为“一带一路”构想的学术支撑和理论基础的丝绸之路学科体系,在学

术界却一直未能建立和完善起来。因此,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理论范式的丝绸之路学科体系,为国家“一带一路”构想和智库建设提供学术理论体系的支撑,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梳理中外学界丝绸之路学科化研究的演进历程基础之上,尝试界定中国丝绸之路学的内涵与外延,并希望构建一个合理的丝绸之路学科体系框架,以求教于方家。

一、丝绸之路学研究的探索与争论

13 世纪末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的神秘且富饶的中国,给予欧洲人无限想象。欧洲的“中国热”直接推动了西方人寻找中国的探险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被迫同意外国人得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引发了新一轮西方人以探险、考察为名的中国探险热。1868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和上海英国商会资助普鲁士地理

收稿日期:2015-12-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SS01)、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前沿理论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策,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

学家、东方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第二次来到中国考察,在其回国后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记》中描述了“公元前 114 年到 127 年间中国、河中地区以及印度间存在丝绸贸易通道”。由此,这条历史上连接亚洲与地中海间人口往来、商品交易、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便以“丝绸之路”之名进入学术视野。

(一)学术视野中的丝绸之路概念流变

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记》中详细说明了中国西北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将张骞的“凿空之旅”视作丝绸之路主要干道开通的标志。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代丝绸之路“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师古曰:波河,循河也)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天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而在公元 1 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所撰《地理志》中亦有关于通往中国道路的记载,“从幼发拉底斯河渡口出发,向东前往赛里斯国(中国)的一条商路。途经石塔(塔什库尔干附近)中转,最终到达赛里斯国都城赛拉(洛阳)”。李希霍芬依据上述两则史料,绘制了历史上第一幅丝绸之路地图。

丝绸之路的概念提出以后,其含义被迅速扩大,并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首先,从时间概念上说,中、西交流的历史远早于汉代,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中国古籍中就有关于中原、羌戎诸部与

西方交通的早期记录。古罗马的神话、诗歌中亦有关于“赛里斯人”及其所贩运“树叶上的羊毛”的表述。随着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深入,考古新发现把东、西丝绸贸易的开端追溯到公元前 4 世纪甚至更早。如阿尔泰墓葬、德国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新疆阿拉沟等地发现并出土的大量中国丝织品、漆器、铜镜等商品,提供了丝绸之路在公元前 5 世纪就已存在的确凿证据。其次,丝绸之路所涉及的范围远广于早期概念。从现有史料可知,张骞所通“西域”旧称“西北国”,汉代“西域”的范围大致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从汉到唐,狭义西域逐渐扩大,即汉代仅仅是指中国新疆的南疆和东疆的吐鲁番和哈密,唐代时已包括了今天新疆的大部分。清朝时新疆一名已经完全代替了西域。而广义的西域,则包括了天竺、波斯、大食等中亚、西亚国家。研究发现,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并非一条固定线路,受人力、物力和地理环境的客观限制以及政治、民族和宗教演化的影响,旧有通道的断续与新通道的开辟,彼此相互交织。秦汉以前,赛种、月氏、乌孙等早期游牧民族由河西走廊迁徙至西域成为当地强大的民族,由东向西的民族迁徙,客观上为后续张骞通西域提供了线路上的参考。最后,丝绸之路运输货物种类繁多,中国商人用丝绸、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阿拉伯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阿拉伯马、铁、铅、锌、钻石、雕像、珊瑚、琥珀、鱼翅、珍珠等商品。“丝绸”一词,已不再指代中西商道上的商品,而成为了一个文化象征符号。

目前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的概念分广义和狭义。狭义的丝绸之路作为指代连接古代中国从长安出发,经阳关、玉门关和西域,经帕米尔高原进入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中亚以及叙利亚、土耳其、北非等地,通过地中海抵达罗马的商旅贸易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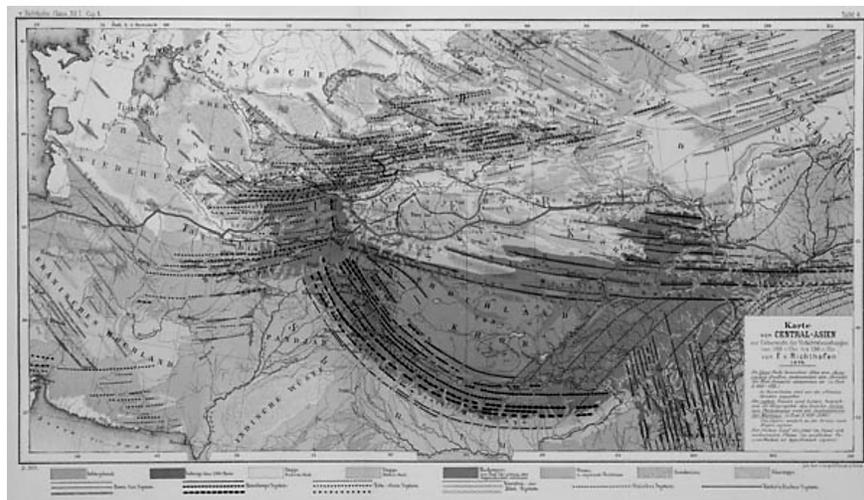


图1 李希霍芬1877年丝绸之路地图

地图出处: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BD1, Fines Mundi, Saarbrücken, 2006:500-501.

道,日渐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除此之外,学界还论证发现了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中印缅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以及交趾古道等数条丝绸之路支线。不仅连接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和地中海世界,海上丝绸之路还连接了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海域、北非和地中海沿岸。丝绸之路上贸易的货物也不局限于丝绸,还包括瓷器、茶叶、植物、动物、美术品等^①。所以丝绸之路更为广义的概念是指“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往的各条通道”^②。

(二) 丝绸之路研究范式的演进

丝绸之路范式的研究,经历了地理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经济研究—文明研究的范式转变,“丝绸之路”概念的流变反映了丝绸之路研究系统化、学科化的趋向。19 世纪末,西方对华大规模探险考察开启了近代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先河。在此之前,中外古籍均是通过沿线索、物、人、事的记录完成对丝绸之路的形塑。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罗马哲学家塞纳的书札,地理学家梅拉普林尼的《博物志》,托勒密的《地理志》等著作中都曾记述了通往“丝国”的贸易通道^③。埃及商人科斯麻士(Cosmas)在《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记述了通往产丝国中国的海、陆两条路线,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称之为“大商路”。张骞通西域之后,通往西域的道路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为“西域南道”“西域中道”“新北道”“河西道”等。中、西对于丝绸之路早期称谓虽不尽相同,但反映出中、西间因丝绸之路的联通而日渐形成了“历史上特殊的人文区域”^④。

随着 16 世纪中、后期西方汉学的兴起,西方迅速获得了欧洲以外其他各国的知识。“中国作为一个认知对象,此后在西方视野中从未消失”^⑤。18 世纪末,西方始兴“东方学”,其核心理念是西方中心主义。萨义德认为,东方学视野下的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而欧洲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这样的思维定式决定了“在东方与欧洲的关系中,欧洲总是处于强力地位,更不必说优势地位”^⑥。西方学界试图构建一套东方话语系统,通过二元划分来塑造一种有利于西方的东、西方关系。1866 年,英国东方学家亨利·裕尔出版了《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几乎囊括了迄今所知的

所有东方知识。1871 年,裕尔出版《马可·波罗游记译注》,成为西方公认的最佳译本。18 世纪末期,在主张“任何科学必须以可感觉到的事实作为出发点,并认为认识的任务就是描述这些可感觉的事实及其规律”^⑦的实证主义浪潮影响下,李希霍芬、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正是依据亨利·裕尔的文本研究开展了对中国的考察活动,并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

“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在中国被广泛采纳相对较晚。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研究东、西方交通的著名学者,如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等,他们将丝绸之路称为“东、西商路”“通往西域的道路”,或“中国—罗马商路”。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齐世和在《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一书中始称“丝绸之路”。同时,在夏鼐及郭沫若的著作中也出现了该名词。改革开放后,国际、国内出现了丝绸之路热,期间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偏见以及东方自我“正名”的努力。

(三) 丝绸之路研究的“立学”争论

丝绸之路跨越千年,丝绸之路研究也已有百余年历史,但对于丝绸之路学科体系研究的争论从未停歇。归纳总结起来争论点有三个:首先,中国学界普遍认为“由西方学者开创、建立的丝路学研究,其丰富内涵和广阔外延,与同时期中国学者的西北史地学具有根本的区别”^⑧。西方的丝绸之路学是依托“东方学”发展起来的,但是深究东方学的所谓学科逻辑起点则是“西方对东方侵略”,完全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⑨。其次,西方“丝绸之路学”被称为“Silk Road Studies”,我国学者认为直译应为丝绸之路研究,因其强调相关知识的集合而缺乏学科应有的逻辑结构,所以不足以称之为“学科”。同时认为“Sinology”“Chinese Studies”被译作汉学和中国学也是不符合学科设置的基本逻辑规则的。最后,中国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对象过于宽泛,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界定,而根本不可能是“独立学科”。耿昇认为,“李希托芬对‘丝绸之路’有确指,即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世界而一直到达希腊—罗马社会的这条交通大道。‘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都是晚期的衍生词,它们具有实用性,但科学性不足”^⑩。而作为依托丝绸之路而产生的“敦煌学”,

学界也认为是个约定俗成的名字。关于“敦煌学”的内涵,学者间的意见并不一致^①。综合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争论基本上是围绕西方研究范式的谬误以及丝绸之路学(包含敦煌学等专门研究)是否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展开的。

虽然丝绸之路学科建设还存在较多争议,但是近年来我国学者仍然尝试将其概念明晰化。自1992年起新疆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在总序中沈福伟认为,“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②。1997年8月28日由《丝绸之路》期刊社组织相关专家召开研讨会^③,专题探讨丝绸之路学学科体系问题。侯灿认为,“研究以丝绸贸易为大宗的陆路干线上发生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其相关的人物事件、绿洲城镇、自然景观等为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④。李正宇认为,“丝绸之路学只能属于文化学范畴,是由诸多分支学科组成的集合体。它的不同分支学科与其他学科具有同一性和重合性,存在着重合和交叉。同时,丝绸之路学内部某些分支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关联和交叉”^⑤。建宽认为,“丝绸之路学乃是一门多种史的因素相互交织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现有的历史学科并不能代替丝路史的研究”^⑥。本次会议是为数不多的就学科建设所召开的专题会议,对于丝绸之路学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此后就丝绸之路学进行探讨的成果较为稀少,周义颉从图书分类学的视角探讨了鉴于丝绸之路学科发展的需要,将丝绸之路文献归类于中图法规定的K历史·地理类目下不妥,建议应参照“敦煌学”设置规则在K87中国文物考古类目下设置丝绸之路学类目^⑦。马丽蓉在2014年出版的《丝路学——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中认为,“丝路学已成为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学科,并形成了欧洲学派、中国学派、美国学派,以及日本、韩国等研究重镇”^⑧。

二、中国丝绸之路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

(一)丝绸之路学科建构的理论准备

所谓“学科”,在辞海中有两种解释,一是学术

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二是“教学科目”的简称,也称“科目”。丝绸之路学的“学”显然适用第一种解释,并强调是“一定科学领域”。沙姆韦认为,“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个‘学科’是说它并非只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来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⑨。显然,“学科”是某一领域内相关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具有严格的认受性蕴意。构建中国丝绸之路学,就必须理清其“相关知识的发展程度”。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标衡量,但仍然可以划定三个考察学科构建的前提要件,即知识的历史积淀、知识的现实需要和知识分类。

1. 知识的历史积淀是学科构建的基础

考察丝绸之路百年研究历程可以发现,丝绸之路知识积淀自19世纪起,经历了初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以亨利·裕尔、李希霍芬、斯文·赫定为代表的各国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加以界定,对丝绸之路沿线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宗教进行了全面考察。“第一次使用近代较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初步廓清了早期丝路研究的范围和方向”^⑩。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的向达、冯承钧、张星烺等老一辈学者在收集整理中、外丝绸之路早期文献的同时,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汉学名著,为东西方知识链接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丝绸之路各领域的专题研究日益深入,在丝绸之路文献学研究领域确立了中国话语体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丝绸之路研究进入知识积累的繁荣期。丝绸之路学术概念得以延展、中西研究合作日益紧密、跨学科研究成果丰富。这期间学术界有关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研究、西夏黑水城文书的发现和楼兰古城、高昌古城等遗址的发掘以及大量中亚、西域文献的辑佚、注释和整理、有关丝绸之路史的考证与研究为丝路知识积累夯实了基础。

2. 知识的现实需要是学科构建的动力

近代中国西北边疆危机,学术界秉承“经世致用”的理念直接推动了西北舆地学一系列丝路专题研究的开展。“舆地,经济切要之务也”^⑪。顾炎武、刘献廷均倡导舆地著作不仅要记载疆域、建置、沿革等,而且要“究天地之故”^⑫,为社会生产服务。由此出现了“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⑬的局面。毋庸讳言,西北舆地

学不仅振兴了学术研究,更服务于时局。清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从转响、进军的筹划,到善后工作的处理,都与战前的西北舆地研究有直接的关系”^④。而中国敦煌学的兴起则更是学者为改变“自(敦煌文书)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⑤的现状而作出的努力。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否定了“欧洲中心论”的错误概念,凸显了中国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当前,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则更需要对丝绸之路系统化、学科化的研究。古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和谐”的交往主题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丝绸之路兴衰规律的把握,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⑥,才能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3.明确的知识分类是学科构建的前提准备

知识分类“是根据特定的需要和标准,通过比较,把人类的全部知识按照相同、相异、相关等属性划分成为不同类别的知识体系,以此显示其在知识整体中的应有位置和相互关系”,目的是“依类分理,各有归属,从而建立起次序化、规范化、系统化的知识世界”^⑦。如前文所述,丝绸之路研究历经地理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文明研究的多次转向,最终成为一个“去情境化”的文化概念。华勒斯坦认为,历史的对象是人的社会活动,社会活动及其价值皆可融为文化^⑧。但文化的内涵与边界界定模糊,仅以丝绸之路的文化范畴作为知识分类的标准是欠严谨的。因此,丝绸之路的知识分类原则应是基于丝绸之路时空概念的“环境重建”,强调地理边界与历史边界统合。将丝绸之路视作一个历史性的地理“区域”范畴,进而审视“丝绸之路区域”内人类实践、历史规律、文化特征与共性作为学科知识的分类取向。

(二)丝绸之路学科体系的逻辑结构

“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⑨。丝绸之路研究向学科体系的迈进是知识积累和现实

要求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亦是中西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研究日益趋同的学术回应。丝绸之路学所研究的知识范畴需要超越单一学科向度,是“丝绸之路”这一重构的历史性“地理区域”中的全部知识集合。当然在强调“丝绸之路”的历史属性的同时不能割断其与现实的联系,对丝绸之路历史的考察、规律的总结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现实问题。所以丝绸之路学不仅研究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其研究对象应该是以区域研究包括海域研究为视角,以丝绸之路的起源、演变及其盛衰为主线,对区域或海域内有关国家涉及丝绸之路的政治外交决策、区域的商贸往来、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以及民族的迁移、人口的流动等商贸网络、人文网络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研究,并揭示丝绸之路演变与丝绸之路区域有关国家外交政策、经贸和人文网络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与联系。

以丝绸之路“区域”研究为基础的丝绸之路学必须有明确的核心议题与理论模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丝绸之路学研究的公共价值愈加凸显。在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上必须超越过去传统的研究框架,不仅对丝绸之路时空表征问题进行研究,更应该深化丝绸之路的内涵研究。基于此,丝绸之路学需要回答如下学科核心命题:(1)如何总结、运用丝绸之路兴衰的历史规律;(2)如何从现有及开发新的知识点中提炼丝绸之路的价值内涵与定位;(3)如何实现丝绸之路的价值转化;(4)丝绸之路区域内、外特殊性与联系的普遍性;(5)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人的实践能力扩大化的产物,如何把握人与丝绸之路区域和谐发展的辩证关系;(6)丝绸之路“区域”内的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间的关系互动是怎样的;(7)如何开展丝绸之路的联通指标体系构建,如何服务于丝绸之路“区域”内决策,等等。这一系列核心议题的提出需要丝绸之路学核心理论来予以阐释和解答。只有确立丝绸之路学原理,才能探寻相关研究的价值整合路径,实现丝绸之路学理论与实践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同。丝绸之路学是一门边缘性和交叉性的学科,无疑需要强调从多学科基础理论中汲取养分、获取思路。丝绸之路概念提出百年以来,中西学者对于丝绸之路基础知识的收集、整理、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知识积累。历史地理学提出“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划分与设



图2 丝绸之路基础理论层次图

定应遵循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⑩，为丝绸之路学的历史性“地理区域”设想提供了理论支撑。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学者艾萨德提出，“采用分析性研究和经验式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对区域内的或空间范围内的社会问题进行细致耐心的研究”^⑪。区域科学的研究思路为丝绸之路学“探寻历史规律解决现实区域问题”的逻辑思路提供了科学方法。软科学所具备的“认知规律、降低决策风险和促进学科交叉发展的作用”^⑫为丝绸之路学知识转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三) 丝绸之路学科体系的综合交叉和边缘性

丝绸之路学是一门边缘性和综合交叉性的学科，无疑需要强调学科的整体与分支、分支与分支、整体与外部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学科层次结构上，丝绸之路学原理规划了学科最基础、抽象的基本运行方式；从分析层次来看，需要对各分支学科研究方法、思维方式进行采集、收集和分析；而应用层面是丝绸之路学知识转化的重要形式（见图 2）。中、西方学者在“东方学”“汉学”“西北舆地学”“敦煌学”“西域学”等学术领域长期从事典籍训诂、考古探索、田野调查中所获取的基础知识成为丝绸之路学的知识供体，构建丝绸之路学也为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三、丝绸之路学科的研究方法

丝绸之路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学科体系，必须具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中外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局限于史料的辑佚和整理、古文书的识读、考古遗址的发掘和史地的考证等，而构建中国的丝绸之路学科体系，应该在借鉴中外相关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区域研究的视角，以整体性和学科的融合、交叉为基本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和丝绸之路区域网络的研究，以揭

示中国丝绸之路学科体系的丰富性及其本质和一般规律。当然，制定统一研究方法和标准还有待于学界进一步深入讨论，这里仅就研究路径的基本思路谈几点见解。

首先，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应采取区域研究的思维。区域研究在地理空间内连接了丝绸之路的区域世界，这是丝绸之路学科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史发展的重要区域。它把欧亚大陆的蒙古、塔里木盆地、准噶尔、西藏、帕米尔、河中、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地区连结起来，并使它们相互依存地发展。而时间上则对接了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延伸。在文明区域间沟通了东、西方文明。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明的母胎，尤其是在这条路的末端部分，曾经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喇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自古以来，还出现了祆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这些宗教向东、西传播并给予人类文化以极大的影响。因此，丝绸之路学必须注重整体性的区域研究。

其次，丝绸之路学还应该以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并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性研究来进行。丝绸之路区域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相互交融的地理空间，而且也是随着地理空间不断演化的动态区域，尤其是丝绸之路区域各主要行为体的政治、外交、经济和宗教、文化的相互交融和互动，不仅推动了丝绸之路区域的兴衰发展，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区域研究的内涵。丝绸之路学作为一门独立和独特的学科体系，其与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有关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动态联系和学科交叉是丝绸之路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之一。因此，在丝绸之路学科的研究中，应该注重其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多维度性，注重研究对象内外的动态联系和交流。强调时间和空间思维的动态联系，不仅可以全面揭示丝绸之路区域兴衰变化的总规律，而且也是构建丝绸之路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研究方法。

最后，丝绸之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无疑应该借鉴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般范畴和理论模型，以创建中国丝绸之路学的理论体系，并处理好继承、

借鉴与创新的关系。丝绸之路学的研究方法应避免简单的线性思维和轻易否定西方研究成果等误区。构建丝绸之路学科体系,必须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思想和西方汉学研究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并加以学科创新。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发展有着客观的逻辑规律,混沌-分化-整合是人类认知过程的基本思路,也体现学科体系的发展规律。丝绸之路学作为多学科的几何体,理应在东西方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保持开放性。强调中国学科的话语体系并非拒绝西方一切学术路径。“东方学”研究框架下的西方丝绸之路研究,虽然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汉学家都是治学严谨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对于丝绸之路学科的构建和研究方法具有重大的启迪价值,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忽视大量由中、西方学者所创造的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严谨学术成果,就难以在传统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体现丝绸之路学科发展前瞻性的学科理论体系,也难以实现学科体系方法论的创新。

注释:

- ①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 ②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BD1, Berlin, D.Reimer, 1877.
- ③班固:《汉书》,第3872页。
- ④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
- ⑤杨共乐:《早期丝绸之路探微》,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 ⑥⑬⑭⑳李明伟:《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历史回顾》,《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 ⑦司马迁:《史记》,第3169-3170页。
- ⑧《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1页。
- ⑨⑰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 ⑩杨建新、芦苇:《丝绸之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 ⑪⑫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⑮[英]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张旭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译者引言,第9章第1页。
- ⑯[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版,第49页。

- ⑰章士嵘:《西方思想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167页。
- ⑱张克非:《中外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发现”及其启示》,《2010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 ⑳耿昇:《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昆明丝绸之路学术会议综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 ㉑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㉒沈福伟:《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光明日报》,2009年12月30日。
- ㉓胡小鹏:《丝绸之路研究呼唤学科理论建设》,《丝绸之路》,1997年第9期。
- ㉔侯灿:《丝绸之路学的涵义、内容及其方法》,《丝绸之路》,1997年第6期。
- ㉕李正宇:《丝绸之路学内容、范围、属性结构之管见》,《丝绸之路》,1997年第6期。
- ㉖建宽:《丝绸之路学的对象和范围》,《丝绸之路》,1998年第1期。
- ㉗周义贻:《“丝绸之路学”立类思考》,《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 ㉘马丽蓉:《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 ㉙[美]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页。
- ㉚江标:《沅湘通艺录(卷五)》,长沙:岳麓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 ㉛(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页。
- 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1页。
- ㉝郭双林:《论清嘉道年间的西北舆地学》,《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 ㉞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文集之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237页。
- ㉟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 ㊱陈洪澜:《论知识分类的十大方式》,《科学学研究》,2007年第1期。
- ㊲[美]华勒斯坦:《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16页。
- ㊳[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 ㊴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

报》,1996 年第 6 期。

④李海波、王建国、齐菲、李星洲:《我国软科学元理论体系框架的初步探讨》《科技管理研究》2013 年第 23 期。

④[美]艾萨德:《区域科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On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 System for China's Silk Road Studies

WEI Zhi-jiang¹ LI Ce^{1 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Sun Yat-sen University , Guangzhou , Guangdong 510275 ;
2.Institute of Marxism , Jishou University , Jishou Hunan 416000)

Abstract : The current essay based on exploration of Silk Road academic history , makes a further exposition of Silk Road Concept and evolution of Silk road paradigm research as well as analysis of argument about “Silk road discipline system” in academia. The essay attempts to expound the research content , core paradigm , theoretic model and subject structure of China's Silk Road subject system and offers the basic research thought and method of regional research , dynamic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 which brings academic back-up to China's discourse academic system and subject paradigm.

Key Words : Silk Road Studies; Silk Road; Subject System; Research Method

[责任编辑 :马瑞雪]

本期特色栏目作者

AUTHORS FOR SPECIAL ISSUES



魏志江,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国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有《中韩关系史研究》《论十到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试论西辽帝国对中亚、西域的经略及其对丝绸之路的影响》等; 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项目。

(文章内容详见第 1—8 页)



何自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出版专著及译著 10 部; 发表论文 200 余篇; 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8、2011 年连续两届入选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 著作多次荣获国家图书奖。

(文章内容详见第 132—139 页)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致力于宗教与国际关系、丝路学等领域研究, 发表论著近 100 篇(部)、主持课题 20 项、获奖 18 项, 代表作有《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等多部。

(文章内容详见第 9—19 页)



罗良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在《经济学动态》等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 数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等权威转载刊物转载。主持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多项, 曾获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湖北省发展研究奖多次。

(文章内容详见第 28—36 页)



关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曾长期就职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外事司、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族群政治与民族政策, 著有《族群政治》等, 发表中、英文论文 30 余篇。

(文章内容详见第 57—68 页)



徐庆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公共外交、话语权和外交转型研究。代表作有专著《崛起之困? 后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论文《中国梦的外部认知与国际传播》《“学术外宣”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关于“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案例研究》等。

(文章内容详见第 102—110 页)